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
程光炜 主编

中国文学与 苏联影响(1956-1960)

〔荷〕佛克马 著
季进 聂友军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
程光炜 主

中国文学与 苏联影响(1956-1960)

〔荷〕佛克马 著
季进 聂友军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荷)佛克马著;季进,聂友军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9011-1

I. ①中… II. ①佛…②季…③聂… III. ①俄罗斯文学-影响-中国文学-文学研究-1956—1960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5616 号

书 名: 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

著作责任者: [荷]D. W. 佛克马 著 季进 聂友军 译

责任编辑: 张雅秋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011-1/I · 235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富华印装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mm × 1300mm 16 开本 17.25 印张 241 千字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从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算起,中国当代文学的建史和研究,已经足足60年。在中国历史上,这60年是社会最为动荡又充满历史机遇的一个年代。但放在一百七十多年来的视野里,人们并不会为它离奇、剧烈、丰富的故事而惊诧。“当代文学”就发生在我们共同记忆的这一历史时段中。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我们无法无视历史的存在将文学看做一个“纯文学”的现象,我们也无法摆脱文学与历史的无数纠缠,将作为研究者的自己置身事外。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懂得中国当代文学学科为何迄今为止都没有像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那样建立学术的自足性、规范性,反而屡屡地被人误解和贬低。更容易看清楚的是,如果当代史观到今天还没有在幅员辽阔的大地上成为一种“社会共识”,那它势必会不断动摇与该史观息息相关的当代文学史的思想基础和学科基础。

当代文学史学科自律性一直缺乏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下限始终无法确定。2000年后至今,当代作家的大量新作有如每年夏季长江无法控制的洪峰一样奔腾不息,声名显赫的老作家也不肯歇笔,对自己的思想头绪稍作整理,并对历史作更深远的瞭望。对新作的关注,仍然是最热门的事业。这就使当代文学很多从业者不得不放弃寂寞的研究,转入更为丰富多彩的当代文学批评之中。当代文学批评在慷慨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鲜视角和信息的同时,也在那里踩踏涂抹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的界限。著名作家的新作,还会冲刷、改写和颠覆当代文学以往历史的价值,“超越”依然是当代文学批评最动人的词汇,正是它造成了当代文学观念的不断的撕裂。这种情况下,当代文学的标准和研究规范经常被挪动,也就不难理解。

本丛书提倡从切实材料出发,以具体问题为对象,对当代文学史的“史观”展开讨论,据此观察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展开,影响文学思潮、流派、文学批评和作家创作的历史因素究竟是什么。将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我们就能逐渐知道,它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环境中失败的症结之所在。

本丛书主张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认为先划出一定历史研究范围,如“17 年文学”、“80 年代文学”等等也许是有必要的,它会有利于研究问题的分层、凝聚和逐步的展开。对具体历史的研究,可能比宏篇大论更有益于问题的细致洞察,强化研究者对自身问题的反省,所谓的历史化也只能这样进行。

本丛书不收文学批评论集,而专以文学史研究为特色。丛书作者以国内一线学者为主,但不排斥年轻新秀优秀著作的加入,更欢迎海外学者的加盟。既为文学史研究丛书,自然希望研究者以经过沉淀的、深思熟虑的文学现象为对象,不做简单和草率的判断;它强调充分尊重已有的成果,希望丛书的风格具有包容性,也主张收入本丛书的著作对不同于自己观点的研究拥有包容性。

本丛书是对 60 年来当代文学史研究多次努力的又一次开始,这是一项长期和耐心的工作。它并不奢望自己的出版能改变什么,但也相信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前途并不糟糕。

程光炜

2011 年 3 月 2 日于北京

中译本序言

相隔四十多年之后,我的《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中译本现在终于面世了。我惊异于1950年代以来中国和中国文学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然而,我书中讨论的许多理论问题与当下的文学却依然相关。

这几十年中,“文化大革命”促成了“样板戏”的产生,在其他文化景观一片荒芜的年代,“样板戏”几乎是仅有的受欢迎、创造性的作品。“文革”后出现了“伤痕文学”,接着是王蒙、王安忆和其他许多作家的成熟作品,然后是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如余华、莫言、韩少功、王朔和海男的作品。当然这些列举只是极为简略的。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试图为自己开创出足够的空间,来创作真正具有国际水准的优秀作品。

我坚持认为本书论述的许多理论问题与当下的文学依然相关,这一点需要更为详细的解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留下了足够的余地,让读者能够欣赏巴尔扎克和其他所谓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小说。如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写道,当巴尔扎克预见到他所钟情的贵族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时,他违背了自己的阶级情感和政治主张。这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事实上,这是文学超越了先验性的政治差别的胜利。同样地,尽管古希腊艺术脱胎于奴隶社会,马克思却对其大加赞赏,这使得文学可以免于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对这两个例子以及它们与中国文学论争的关系本书都有所论述。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中,至少就十月革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文学而言,独立的文学创作总能找到一席之地。这在当代文学中也表现得愈来愈明显。

《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论述的是一个绝对服从历

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时代。伴随“文化大革命”而来的,是一个更加严格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阐释文学的时期。比如周扬提出,并非所有的生活现象都可以缩减为单一的阶级斗争图式,因此而受到姚文元的批判。周扬的确曾经使用过“全体人民的文学和艺术”这个说法。同时,周扬还因为将艺术定义为“形象思维”而受到非议,其实“形象思维”作为一个源于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概念,经由19世纪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的作品,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流行用语。“文革”时期那些极“左”的批评家否认作家拥有某种个人化的通过想象和艺术手段寻求真理的方式。他们主张一种和苏联美学截然不同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文学观念。如果按其逻辑推论,这种严格的唯物主义观念必定和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相冲突,也和马克思为古希腊文学和艺术所作的辩护相冲突。在《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八章(第二部,第十五卷)中,我对“文革”中的这些争论有着更为翔实的论述。此书汉译名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由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文革”时期,严格的唯物主义文学创作理论推动了意识形态的审查机制。作家们借助于暧昧的语言,比如使用隐喻,或强调直觉知识,已经不再能避免政治控制。这是一次最坚决的摧毁文学虚构的尝试,在如此严厉的情形下,小说虚构被视为作者政治信仰的表达。作者和叙事者之间再也没有区别,甚至是小说中某个特别角色的政治罪名也会直接归罪于作者本人。这一切确确实实几乎扼杀了文学创作。1967年到1971年间,《人民日报》或《红旗》从未积极评论过任何现代或传统小说,也没有积极评论过某个诗人的诗作——除了毛泽东的诗歌。

这些激进的观点显然不值一驳。在现代,没有哪个政权可以阻止文学的生产。也许一个政权可以阻碍文学作品的出版和发行,却不能阻止人民思考和记录自己的思想。任何人只要买得起一支笔、一叠便笺,原则上都可以成为作家。和作曲、电影与绘画不同,写作不需要购买昂贵的器材或专门的材料用于工作。因此,写作可以被看做最为民

主的艺术之一。

然而,并不仅仅是因为材料的原因,文学才没有被连根拔除。文学写作是人类交流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文学讨论的话题都是报纸、科技刊物、政治节目、政府法规通常不会涉及的话题。我正在思考关于个体之间关系一类的话题——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社会与个体角色的关系。通过文学,我们可以读到各种寻找生命意义的尝试。它教会我们何时哭泣,何时欢笑,何时讽刺,何时缄默。作家通过文学话语和个体读者取得沟通,获知什么才是他或她发现的生命的意义。如果一个作家,比如罗伯·格里耶,从某个角度说“世界既无意义也不荒谬,它是那样简单”,没有政权可以干涉,因为这纯属个人观点。当然,我们不需要把这当做终极智慧。为了让生活值得继续,为了让世界可以忍受,我们和其他人互相配合,共同为我们的生活和这个世界创造意义并且让一切富有意义。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意义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有些人在宗教里寻找意义,但在不笃信宗教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和绝大部分欧洲地区,许多人通过文学或其他艺术表现形式来寻找人生的意义或了解人生可以拥有何种意义。一个人自己的人生能够拥有何种意义,这个问题只能由其本人来回答。正是每个人去聆听小说和诗歌中传达的声音、理解小说和诗歌中传达的事件,也许文学才在我们寻求人生意义方面有所助益。

对意义的需求是一种基本的人类学和心理学需求,这让废除文学变得毫无可能。“文革”中根除想象力自由发挥的企图注定会失败。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更证明了小说和诗歌的顽强生命力和不可或缺性。当一些悲观的西方同仁怀疑创造性作品的未来时,我却常常指出最近20年中国文学创作的复苏和活力。

本书是基于对受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刻影响的文学理论的理性分析。如今各种其他文学理论变得流行起来,但是理性分析的方法仍然是科学研究的基石。1968年结束了两年荷兰外交官生涯离开中国后,我开始在乌得勒支大学教授比较文学。我始终将拓展文学的科

学研究作为我的目标。这一目标从我与我妻子 E. 蚁布思合著的 *Theories of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中得到展现。此书中译本为《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88)。还有更新的 *Knowledge and Commitment: A Problem - Oriented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中译本已于 1996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

当然,当今的文学研究已不再由鲜明的意识形态所支配,但依然受到研究者考虑的特定难题或疑问,和可以解决难题或回答疑问的理论及理性研究方法所制约。任何熟悉科学哲学的人都会发现,我们受到了卡尔·波普尔作品的影响。

我相信《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中的论述并未过时。本书论述的那段文学史,很多方面都有别于目前的情形。但是,政治和文学创作间的冲突是永恒的,尽管今天的冲突较之 1950 年代、1960 年代表现出更高的层次。也许有人会说,政治家也可以求教于作家,求教于他们想象力的不尽源泉,求教于成千上万作家的创造力,求教于高度集中表现社会的小说。如果这些小说是写实性的,它们就提供了一个社会生活的宝库,如果它们是乌托邦式的,它们就可以启发政治家重审其长远的目标。

1965 年本书第一次出版之后,学界又出现了许多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专著。在这里逐一列举这些出版物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些著作对本书的论述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然而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翻译的 1943 年版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我在第一章中对“延安讲话”的讨论根据的是中国官方 1953 年版的《毛泽东选集》。如果在 1965 年就知道更早的 1943 年的版本,我一定会加以参阅。有趣的是,较早版本的提法是“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表明毛泽东从未倾向于后一种提法,而后者 1958 年最终被“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所替代。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领导人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带有苏联烙印

的概念。还有一些两个版本之间不太重要的差别,此处不再讨论。

最后,我要向苏州大学的季进教授、聂友军先生表达我诚挚的谢意。同样也要感谢所有在此书的中译和出版方面付出宝贵时间的朋友们。

D. W. 佛克马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2006 年 10 月

前 言

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中国“百花齐放”及稍后时期(1956—1960)“文学”一词到底意指什么。尽管研究的对象只限于短短的几年,但对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理论历史进程的描述,似乎是颇为有效的研究途径,因为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凡是来源于中国的文学的概念都是有待商榷的,我们讨论的是一个统一、明确的对象实体。这一点必须加以强调,因为我们涉及的那个时期的文学及文学评论众说纷纭很不一致,甚至党在文学事务方面的正统立场也表现出某种变动性。

党的正统立场来自于毛泽东与周扬的理论阐述,中国文学理论中绝大部分“文学”的定义,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论述那里。然而,对文学批评家和政治家(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所提出的对文学的要求进行观照,还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文学”一词在中国的含义、“纯文学”在党的思想体系中的位置以及文学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需要考察的材料包括文学批评著作和对文学的任务、功能、形式及主题的一般论述。研究文学作品有时也同样有用,因为它们是文学评论的对象,或者是文学原理实际运用的产物。研究翻译某些西方及俄苏文学背后的取舍原则,以及重编中国传统文学的遴选原则,也有助于阐明中共理论家所坚持的文学的概念。

该研究的另一目的是对苏联文学的影响作出评价。中国文学的理论与苏联理论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如果不了解它们的苏联原型,中国文学理论的某些特征是很难理解的。这里我们必须把“影响”与“相似”区分开来。中苏两国某些共性因素的作用决定了它们的相似性,两国在社会组织方面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掌控的。正因为这个原因,要清楚地确认苏联文学与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影响,就必须梳理中国文献中明确提到的苏联文学作品和理论,找到苏联著作和文章的中文翻译,或者苏联作家与中国同行个人接触的迹象。

本书对苏联文学影响的考察截止于1961年之前,这一年周恩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大会上公开批评了赫鲁晓夫缺乏认真的马列主义的态度,中苏两党对马列主义理解的分歧首度公开化,或许治思想史的学生对此会感兴趣。相比起纯粹政治性、理论性的党的文件,文学作品的影响不容低估。可以看到,1956—1960年期间,中国主要接受的是特别类型的苏联文学作品,而这个时期苏联出版了大量的出版物,但至少从官方来看,却鲜有在中国受欢迎的作品。

那几年中国的文学批评非常繁荣。一些作家提出的“修正主义”理论迫使其他作家来表明自己的正统观点,它们通常来自于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观点。文学的正统理论最终使所有的异议销声匿迹,从第三次作代会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次大会原计划于1957年秋召开,最后推迟到1960年七、八月份。

在此,我想对本书撰写过程中以不同方式帮助过我的所有人表示感谢。

特别感谢莱顿大学的赫尔斯韦(A. F. P. Hulsewe)教授,他一直是我的老师,指导我从事中国研究长达12年之久,并接受本书原稿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我也非常感谢泽克(E. Zürcher)教授和琼克(D. R. Jonker),感谢莱顿大学的里夫(K. van het Reve)教授审阅了本书初稿并同我讨论了关于苏联文学的某些章节。

感谢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陈世骧(S. H. Chen)教授、白之(Cyril Birch)教授,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C. T. Hsia)教授给予我的宝贵帮助,他们评论了不同阶段的文稿,我从中获益巨大,当然,若有任何错

误,应由我自己承担。夏济安(Tsi-an Hsia)教授深刻博识、经验丰富,每有请教,都受益匪浅,这个月传来他在伯克莱英年早逝的消息令我震惊。感谢希特(Roxane A. Heater)小姐和斯特尔(John. A. Settle)先生对本书不同部分所作的善解人意的编辑。我还要感谢莱顿大学汉学研究所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所有同事,感谢他们极具成效的帮助。

联邦基金会(The Commonwealth Fund)给予我哈克尼斯奖学金(Harkness Fellowship)的资助,使我得以在1963—1964学年在伯克莱研修。没有它慷慨友好的帮助,本书尚不会完成。最后,也非常感谢荷兰外交部长准许我请假离开,从而使我有机会接受该奖学金。

D. W. 佛克马

荷兰,沃伯格

1965年2月

目 录

中译本序言	(1)
前言	(1)
第一章 历史的梳理	(1)
第一节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
第二节 延安的批评:丁玲、艾青、萧军等	(11)
第三节 战争及战后年代:胡风	(19)
第四节 赵树理与周立波	(27)
第五节 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49)	(32)
第六节 周扬、苏联文学与第二次文代会(1953)	(36)
第七节 俞平伯和《红楼梦》	(43)
第八节 冯雪峰和胡风	(48)
第二章 对知识分子的新政策(1956年1月—4月)	(55)
第一节 周恩来、毛泽东、郭沫若论知识分子问题	(56)
第二节 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会议:周扬与茅盾的讲话	(58)
第三节 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	(66)
第四节 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对典型的解释	(69)
第三章 非斯大林化(1956年4月—1957年2月)	(80)
第一节 国际政治背景	(80)
第二节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陆定一的讲话	(84)
第三节 高期望与不同的反应	(87)
第四节 批判,不是为幽默而幽默:何迟与王蒙	(93)

2 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

第五节 对传统的关注:纪念活动与毛泽东诗词	(98)
第六节 对苏联新思想的非官方反应	(103)
第四章 双刃剑(1957年2月—6月)	(112)
第一节 毛泽东论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运动	(112)
第二节 对双百方针范围的讨论:陈其通和茅盾	(116)
第三节 关于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国际论争 ..	(119)
第四节 五月至六月初早谢的“百花”	(124)
第五节 “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遭到否弃	(132)
第五章 反右运动(1957年6月—1958年2月)	(138)
第一节 修正主义,主要的危险	(138)
第二节 文学大辩论始末	(141)
第三节 “丁陈事件”与冯雪峰	(149)
第四节 艾青与其他遭再批判者的反抗	(155)
第五节 追随者与独立作家	(159)
第六节 赫鲁晓夫文学理论受到肯定	(170)
第六章 大跃进(1958年3月—1959年12月)	(177)
第一节 人民公社与“不断革命”	(177)
第二节 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	(181)
第三节 群众文艺创作运动和诗歌形式问题	(186)
第四节 文艺与物质基础的新关系:周来祥的解释	(192)
第五节 盲目乐观主义的需要:对巴金等人的批判	(197)
第六节 对帕斯捷尔纳克与爱伦堡的批判	(204)
第七章 第三次文代会及其前奏(1960年1月—8月)	(215)
第一节 后斯大林时代的正统性	(215)
第二节 人道主义与艺术“永久价值”:对巴人的批判 ..	(217)
第三节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	(225)
第四节 双重真实	(232)
第八章 结论	(238)

第一节 中国文学的实质与变化	(240)
第二节 中国对苏联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态度	(248)
译后记	(258)

第一章 历史的梳理

1956年1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就知识分子的问题发表了讲话。这一讲话对此后几年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文学创作一个短暂的、某种意义上也是虚假的自由化时期。要了解1956—1960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必须先对此前的文学理论做一番梳理。由于已有多部专著论及了之前的文学创作与意识形态情况^①,所以这里我们仅谈一些直接影响到文学理论产生的事件和问题。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六个月,当盟军在远东战场节节败退、德军直插苏联的心脏时,一次重要的文艺座谈会在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召开了。直到1942年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一直困守在偏远多山的陕西省境内。此前一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军队发生冲突,即皖南事变,使得原本摇摇欲坠的国共统一阵线最终瓦解。当时日本侵略军占据内蒙古,蒋介石的部队驻扎在新疆,从而切断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交通线,苏联正忙于生死攸关的决战期,根本无暇顾及延安的共产党政权。况且莫斯科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几乎没抱多大希望,因为抗日战争

^① 参见 Cyril Birch(白之),“Fiction of the Yenan Period”, *The China Quarterly*, 1960, 4, pp. 1-12; Albert Borowitz, *Fiction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54; Theodore H. E. Chen(陈锡恩), *Thought Reform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 夏志清(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普实克(Jaroslav Prusek), *Die Literatur des befreiten China und ihre Volkstraditionen*, Prague, Arta, 1955。

所有参考书目资料都将在注释中注明,书末不再附列参考书目,因为绝大多数引文资料都来自较为短小的文章,篇幅所限,不再对它们进行汇编。